

Y708/06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石家庄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6 印张 147,000 字 印数: 1—625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86·23 定价: 0.55 元

目 录

蔚县建党前后的回忆·····	赵振中(1)
隆尧县的建党活动和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1924—1937) ·····	张子政 郭慕文(13)
红二十四军的片断回忆·····	陈子毅(28)
留取丹心照汗青——记赵官寨六十二烈士 ·····	馆陶县民政局 冀南烈士陵园(38)
苏村阻击战的回忆·····	秦 光(52)
英雄的潘家峪·····	唐山地委《支部生活》编辑部供稿(62)
抗战时期冀中九分区地下交通工作·····	辛以勤(81)
我国最早的高等农业学校——河北农业大学(1902—1949) ·····	苏润之(87)
北平和平解放亲历记·····	李同伟(131)
抗战初期河北民军的兴起和溃散·····	尹汝谋(149)
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兴亡·····	赵 兰(166)
我所知道的曹锟——兼述北洋军阀混战情况·····	赵 兰(176)
龙云南京虎口脱险记·····	李师弼(187)

蔚县建党前后的回忆

赵振中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8 年秋，我正在蔚县西黎元庄联校教书。当时，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苛捐杂税成灾，人民群众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学校教育也极其腐朽，广大知识分子对现状都极为不满。到了年底，听说张希贤（现名张苏）从陕北榆林回县当了教育局长。张希贤早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在蔚县颇有声望。不久，得知经张希贤提议，当局批准，把县原简易师范学校改为初级师范学校，校址迁至离县城四十里的西合营镇。教员多是从北京聘请的国外留学生和大学毕业生。这些情况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机不可失，我立即决定去投考，以求深造（我仅高小毕业，按当时的要求不够当教员的资格）。这次和我一起考取的有小学同学方星五、杨普泽、李大愚、邹嘉甫、赵占春等。入校后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对蔚县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从课程来看，设有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伦理学、三民主义、军事学、军事操等。还有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以及史地。这和当时一般师范学校是大不相同的。教员孙铁夫（当时是共产党员）讲授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廖石生讲授社会发展史和哲学、政治经济学，这些科学对我们青年学生启发很大，使我们初次接触到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新思想。学校图书馆也购进了大批革命书刊，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政论文章，有鲁迅、郭沫若、胡适等人的文学作品，有《拓荒者》等左翼文艺刊物。大家贪婪地阅读着这些进步书籍，思想境界有了新的变化。张希贤曾几次到师范学校作讲演。他列举大量事例，淋漓尽致地揭露现行社会制度的种种黑暗，指出只有彻底革命才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出路。他的每次讲演，都使广大师生受到很大鼓舞。由于以上这些，学生的思想觉悟大为提高。学生会又出版了校刊《洪涛》，刊载的文章都是本校的进步教师和学生写的。记得发刊词上有这样的话：“我们如洪水，向世界横流，冲垮旧社会的堤坝，把祖国的大地浇灌”（大意）。学校还组织了学生军，按照连、排、班编制。一律身着灰色军装，胸佩学生军徽章，手持教育枪。每天清晨，学生军列队出操，先跑步，而后进行队列教练（连横队、连纵队、正步走、刺杀等）。矫健的步伐，高亢的“杀！杀”声，给黎明带来无限的活力。1930年开学不久，即发动了第一次学潮，当时校长是沈景周，北大毕业，有进步思想，但胆子太小。他看到课程、图书馆、学生会、《洪涛》校刊，以及学生各种进步活动，即有些害怕，总嫌步子走得太快。因之，他就成了前进的阻力，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学生群起而攻之。学生提出：“反对开倒车，要前进”！“赶走沈景周”等口号，实现了全校罢课。不几天即把沈景周赶走了，校长由孙铁夫代理。到三月末，学生军借蔚县城庙会之机，以旅行名为名到城里去进行宣传。一路上敲着鼓吹着号，唱着雄壮的国际歌，精神抖擞，步伐整齐。不料队伍来到县城东门，当局竟拒绝学生入城，经过几番交涉，据理力争，当局才被迫让学生进入城内。进城后，大家分片讲演，演革命节目，搞得十分活跃，围观群众水泄不通。蔚师革命师生的进步活动，使蔚县的官僚政客、土豪劣绅、老学究们，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他们咬牙切齿地咒骂：“蔚师一定出了万恶的共产党，不给他们

点厉害瞧瞧，咱们就别想安宁。”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反动派就下毒手了。1930年5月间一天深夜，县公安局长朱汉三亲自率领公安队和警察三百余人，全副武装，带着绳索，突然包围了蔚师。他们如临大敌，匍匐前进，到了学校门口，越墙而过，偷偷地爬到宿舍，每个宿舍派二、三名持枪上刺刀的士兵和警察看守起来。结果，教师孙铁夫、廖石生和在《洪涛》上撰文的十四名学生（化名的幸免）被捕，并捣毁了部分校舍。在这次搜捕师生和捣毁校舍的过程中，朱汉三手提东洋刀到处巡视。在抄图书馆时，只要看到书皮有红颜色就撕毁或扔掉。最后召集全校师生在礼堂前训话。这个土军阀横眉竖眼，闪着凶光，把杈开双脚，两手拄着东洋刀，恶狠狠地骂道：“闹他妈什么马克思、牛克思！我们都是靠龙王爷吃饭的。北京学生闹共产党，不是都杀掉了吗？今后谁要再闹共产党，我就要砍掉他的脑袋！”朱汉三还当场宣布解散蔚县师范，学生不得在西合营逗留，立即各回各家。当时北京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镇压蔚县学生运动一事连声叫好。北京的《大公报》以显著的版面大登所谓“蔚县公安局抄灭共产党大本营蔚县师范，全部要犯均被逮捕”云云。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革命人民没有丝毫民主、自由可言。但这丝毫不能说明反动派的强大，相反，却恰恰暴露了他们的腐朽、胆怯和无能。

反动当局的残暴镇压，不但不能使革命师生屈服，相反，更激起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军警刚走，进步学生立即秘密开会，研究对策。大家认为，营救遇难师生是当务之急，并商定了具体办法：派方星五、孙爱兰、田子久到北京与被捕教师的校友联系营救；派杨普泽、郭元到张家口，通过关系，呼吁各界同情、支持，营救被捕师生；我和乔忠等人留在本县募捐和与学生联系，照顾狱中师生的生活。我们曾两次冒着风险，带着鸡蛋等食品到监狱探望被捕者，把外面进行营救的情况告诉他们，鼓励他们不

屈不挠、坚持斗争。狱中的师生激动地含着泪花说：“请你们转告全校师生，我们是有热血的男儿，不是奴颜卑膝的软骨头。”尽管敌人软硬兼施，以杀头相威胁，以复学相引诱，企图使学生出卖孙铁夫等教师，承认所谓“罪行”，都遭到了严正的回击。经过四十多天的斗争，当局不得不因“罪证不足”释放了被捕学生。四名教师则被转解到张家口监狱，后经多方努力营救，始得脱险。

二、第一个党小组的诞生

1930年6月间，我突然收到了署名张希贤从北京发来的一封信，信中让我和郭元赶赴北京，报考打字学校。当时，张和我们不熟，我深感信中一定另有含义，估计可能是方星五介绍的，经过反复思考，不解其意。尤其是在反动当局刚刚围剿所谓共产党大本营之后，又考虑到郭元这个人在学生运动期间言行不一，有两面派行为，我即决定不理他，独自踏上进京的路程。一路思索，地址不详，何处去找？考虑还是先找到营救被捕师生未归的方星五再说（他家在北京有个小商店，在新街口附近，店名叫“北万盛”）。等了几天，见到方星五，他立刻把我领到西山镶黄旗南营子十三号一座独户小院里。原来，方星五、杨洪甫、刘静斋都住在这里。这个小院住着一户满族人，全家三口，老两口都已五十多岁，男人常在外做活，女人在家，另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这个院子非常僻静，常租与夏季到西山避暑的人，这样，习以为常，社会上毫不介意，很便于秘密活动。我去后，首先接见我的是柳子才同志（朝鲜人）别人称他韩国柳，他和我谈了话。以后，他经常到我们的住处，和大家讲国际国内斗争形势，讲在中国进行武装革命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事后我才知道，蔚县的学生运动，不仅惊动了敌人，也引起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的重视（当时蔚县属察哈尔省，无地下省委组织）。这年六、七月，秘密

从浙江温州赶回北京的张希贤同志和当时的北京市委组织部老柳同志商定，从蔚县师范选几名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到北京受训，以便培养党的干部，建立党的组织。顺便说一下，张希贤同志在此之前，并未在蔚县建立党的组织，只是作了不少宣传工作，并在教育界打下了一个坚强的思想基础。他的活动直接受北京市委的领导。过了一段时间，柳子才同志找我谈话，他问我愿不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愿不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当时激动地攥住他的手说：“我在学校对马克思主义就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惜无入党的门路，这些日子你谈的话，对我更有启发，我真诚地志愿加入共产党，永远跟党走，为共产主义奋斗一辈子！”入党时，我报的名字是赵越峡，意思是终于越过高山峡谷，克服了种种困难，参加到了党的行列。入党后，我和比我入党稍早的方星五、刘静斋、杨洪甫在一个小组活动。这个党小组，就是蔚县建党史上第一个党小组。过了一些日子，北京市委要我们到天津受训，老柳同志和我们交代了到天津后的接头地点和联络暗号。每人还发了五块现大洋做生活费。到了天津，我们四个人分住两个地方，这是党组织指定的。我和方星五住在中原公司宏益栈。杨、刘住在什么地方不清楚。等了大约五、六天时间，负责和我们接头的那个自称姓陈的同志告诉我们，和上级的组织关系接不上了，让我们先回北京，如到北京仍找不到组织，就回原籍继续领导学生运动，发展组织。回京路上，在天津站碰到杨洪甫和刘静斋，他们说要到唐山去。自那分手，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俩。我和方星五重返北京后，组织关系根本无法联系，我俩只得回到了蔚县。恰好，师范又开学了。这年八月，我和方星五又入了西合营师范学校。

三、学生运动的新高潮

复学后的蔚县师范，形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校长换成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宪章。并从山西聘请了一帮年龄五、六十岁、政治反动、不学无术的家伙们当教员。把个生气勃勃的蔚师弄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进步的课程和书刊都被取消查禁，凡是带点进步色彩的书籍，都被看成大逆不道。腐朽不堪的老古董又被当作圣经端了出来。那些老学究们又登上了讲坛，摇头晃脑地念起“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来了。为了笼络人心，王宪章采取了怀柔政策，见到学生即面带笑容地问寒问暖。这一倒行逆施的鬼把戏被绝大多数学生所识破。这一帮无耻之徒，为了吃饭跑到蔚县。不识几个大字，硬拿着书本在课堂上死读，读的句子也不连贯。尤其是在学生们非常拥护的廖石生、孙铁夫等教师之后，这些无知的家伙来做教师，误人子弟，学生们对此极为不满。面对这种情况，受过革命教育的进步学生，再也不能保持沉默，继续忍耐下去了。于是，在这年冬天，（大约十一月间），方星五和我以及学潮中的积极分子杨普泽、邹嘉甫等十余人又发动了第三次学潮。我们在学校揭示处贴出了王宪章十大罪状，联名写信给县教育局、省教育厅，要求撤销王宪章的校长职务，并改组学校。我们立即举行了罢课，并请愿示威。斗争的结果，我们赢得了初步的胜利，王宪章被调离学校，被查封的图书重新开放，那帮无耻之徒，也卷起铺盖滚蛋了。这就更引起了军阀政客、老学究的恐惧和憎恨，他们决不肯就此善罢甘休，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夜以继日地想方设法对付我们，伺机反扑。从此，学校的斗争更加尖锐了。1931年2月，调来了著名的镇压学潮的能手李明士接任校长。此人外号“小钢炮”，是个阴险毒辣的学阀，有一套镇压学生运动的办法。他到职后，表面上伪装进步，暗中挑拨

离间，拉拢意志薄弱的学生，监视进步学生，并极力在学生中寻找、收买效忠于他的奴才。李明士勉强维持了一个学期，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费吹灰之力，侵占了东三省，激起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抵抗主义的极大愤慨。全国救亡运动迅速高涨，蔚县师范的革命学生也自动组织起来到大街上宣传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小钢炮”指示他的爪牙王泽民、马道生等大肆灌输“新月派”的资产阶级文艺，贩卖大批黄色歌曲，用以麻醉同学们的革命意志。这一手失败后，他竟气急败坏地亲自出马，严格限制学生上街宣传。于是，两种势力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重新激化起来。1931年11月，方星五、杨普泽和我再次组织全校学生进行斗争，历数李明士破坏抗日、限制进步、倒行逆施的罪行，联名上书察哈尔省教育厅进行控告。李明士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竟卑鄙地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我们便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我们尽量团结中间派，争取落后同学，揭露、孤立极个别“保皇派”。斗争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不料，李明士狗急跳墙，凭仗有反动当局撑腰，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卑鄙手段，竟蛮横到将方星五、杨普泽和我等十几名领导学生运动的同学开除出校。他们满以为这场“杀鸡给猴看”的把戏一上场，学生运动就可镇压下去，从此就太平无事了。结果和他们的如意算盘相反，我们被开除的学生聚集在杨普泽家里，继续写申诉向上控告，散发传单向各方求援。留在学校的李大愚等人组织同学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校内校外相互呼应，搞得“小钢炮”不得安宁。在此情况下，县当局被迫找被开除的学生谈判，答应发给被开除的学生二年肄业证书，并安排当小学教师。我们明确地告诉他们，这两条不是问题的核心，不撤掉误人子弟的李明士，不改组学校，我们的斗争决不停止。为了不使事态继续扩大，当局只得答应下学期撤掉李明士的校长职务，被开除的学生全部安排做小学教师。斗争又一次取得胜利。

四、县委的建立和党组织的发展

从1930年8月到1932年春，我和方星五从北京回县后，因为失掉了组织关系，加之只有我们两个党员，党的组织也就无法建立。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领导和推动了两次学生运动。到了1932年夏，北京市委听取了张希贤同志关于蔚县学生运动情况的汇报，认为在蔚县成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并派薛效文、刘般若和方星五到蔚县帮助建党。薛效文在西合营东瓦窑，即顺便从附近找了几个在学潮中经过考验的骨干开了会，并发展杨普泽等人入党。不久便成立了蔚县县委，由薛效文任书记。（薛效文调走后由杨普泽任书记）我当时教书的地方距离西合营较远，事前没有得到消息，未能参加这次会议。1932年冬，薛效文离开蔚县后，（经文化革命中的调查，才知薛效文到北京后被捕）北京党组织又派武月亭、钟仿伾来蔚县工作。为了便于活动，武月亭经张希贤介绍到蔚县师范任教员。在他的领导下，蔚县师范很快成立了党支部，这是蔚县成立最早的基层支部。后来，北京党组织又让河北省袁敏同志来检查工作。他指示要十分重视党组织的发展工作。根据这一要求，县委认真地讨论了党的发展计划，并做了相应的决定。这次会议之后，党的组织有了迅速发展。我调到白乐联校后，先后发展了杜廷举、赵智两名农民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培养了赵有福、赵永等一些发展对象。在这前后，杨普泽在会子里，阮泊生在北水，杨禄在吕家庄、杜钰，李效先在李邻庄，邹嘉甫在东水泉，方星五在前堡，贾权在西北坡一带，冯××在北水泉都发展了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到1932年底，全县已经建立了十几个党支部，发展党员近百人。但当时的情况，党的发展大部分是在教职员和青年学生中间，党的活动基本上没有超出知识分子的范围。为了唤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

民起来参加革命斗争，党的工作重心必须转向农村。1933年春，在会子里召开了一次全县党代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杨普泽、方星五、邹嘉甫、阮泊生、杜钰、李大愚和我等约二十余人。会议讨论了党的组织改建，在农村建党，党的经费来源，以及成立“抗捐大同盟”和编印党刊《光明之路》等问题。这次会议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正式成立了县委。由杨普泽任书记，邹嘉甫任组织部长，我和方星五共同负责交通联络部。会议还规定了彼此联络的秘密交通站。杨普泽的家就是县委所在地。他当时是一人独居的光棍汉，同村农民党员李贵也是个光棍汉。他们以卖零星食品为掩护，家中并购置了几件乐器，晚上即唱起秧歌来，人们走后即秘密开会，如此掩护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转移了地点。

五、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

党代会之后，县委出版了秘密油印刊物——《光明之路》。刊头的右上方是光芒四射的太阳，左下角是一只报晓的雄鸡。寓意是向人民宣告早晨和光明将要照耀中国的大地。《光明之路》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出版的。北京党组织秘密运来一架油印机，安放在会子里沈善功（党员）家里。出版的刊物和党的活动所需经费，大多是我们担任教师的同志负担。虽然大家的薪水并不多，但每次都是毫不犹豫地把所需的费用拿出来。杨普泽先后变卖了将近一半的家产，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光明之路》每半月出刊一次，每次印发五十到一百份。主要内容，有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反对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反对封建军阀的苛捐杂税，介绍南方苏区红军的革命斗争情况等，并编写些歌谣，散发到学生和农民中去。《光明之路》还选载了《共产党宣言》。每期有论文、歌曲、插图。文字通俗易懂，内容新颖丰富。杨普泽、阮泊生、杜钰，李大愚和我，是主要撰稿

人。当时还专门设置了政治交通员，由他们秘密地将刊物运交各地党组织，再由各地党组织通过亲友关系散发到农民群众手里。东黎元庄玉皇庙有个老道叫孙长智，是我们的地下党员，他经常以老道的身份外出化缘、行医、散发《光明之路》。

《光明之路》传播的革命思想，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为党在农村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农村的党组织有了迅速发展，新建了东黎元庄、南梁庄、西双培、大德庄、张庄等十几个支部，党员也有新的发展，党活动的范围也扩大了。1933年春，武月亭离开蔚县后，北京党组织又派抗日同盟军前委王纯一来蔚县领导党的活动。王纯一到蔚县后，开始找不到党组织，就给人家扛长活，打短工。直到秋后，几经曲折，才接上组织关系。王纯一同志善于接近群众，深受群众爱戴，他经常在地头、炕头向农民群众讲述红军的故事，讲苏区农民如何过好日子，讲苏联革命成功后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景象。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农民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当时，苛捐杂税成灾，除了土地税、房产税，还有什么人头税、山货木料税、麻税、煤税、屠宰税、水果捐、小票捐等等，繁重的税捐，使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了产，被迫背井离乡，外逃谋生。要争取人民的生存权利，就必须开展抗税捐斗争。1933年春，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反帝抗捐大同盟”，领导农民、手工业者起来斗争。县委的决定，得到全县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参加“反帝抗捐大同盟”的盟员就达四、五百人。各地都成立了反帝抗捐组织。党刊《光明之路》紧密配合这场斗争，介绍各地的抗捐斗争经验，编写新歌谣让农民演唱。1933年底，由杨普泽和我主持，在会子里召开了全县“反帝抗捐大同盟”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约四十余人。会议开了一整夜。会上着重研究了如何把抗捐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的问题。会议计划，趁年关群众赶集时，在县城、西合营、代王城、吉家庄、桃花、白

乐等城镇，同时举行抗捐大暴动。后来，由于组织不严密，敌人事先得知风声，采取了严密防范措施，这次暴动计划未能实现。但它从来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唤起了农民群众的斗争热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并为以后的抗捐税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不久，在白乐镇的集上，以抗捐盟员赵开为首的几百名群众砸毁了税务局的过柴秤，踢翻了他们的过粮斗。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继占领东北全境之后，又出兵占领了热河和察哈尔的北部，察南各县岌岌可危。国难当头，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采取任何抵抗措施，一而再、再而三地拱手退让。当时蔚县国民党县党部连大门口的牌子都摘掉了。他们还下令解散一切抗日组织，停止一切抗日活动。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蔚县人民的极大愤慨。在县委领导下，蔚县师范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紧接着，全县又召开了“抗日御侮救亡大会”。揭露了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破坏抗日的罪行，宣传“国难当头，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在摇摇欲坠的华北国土上，树起了一面抗日斗争的旗帜。县委还派人到蔚县大南山勘察地形，准备以后在松枝口峪建立人民武装，进行游击战争。

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奔赴抗日前线。消息传来，人心大振。蔚县党组织当时虽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但也迅速采取了行动。一天夜里，我和杨普泽、方星五、阮泊生等同志在会子里编印了大批标语和传单。主要内容是：

“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

“联合起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迎接红军东渡抗日！”

“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等等。

在西合营集日前的一个深夜，组织了一部分党员，把标语、传单贴到西合营的墙上，撒在群众赶集的路上，还把成卷的宣传品扔进驻军的兵营里，还到处传播中国红军快打过来的消息。听

到这些喜讯，全县人民无不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国民党反动当局却惊慌失措，他们派出大批军警到街上巡逻、盘问、搜查。但是，这些笨蛋没有抓到一个共产党，只抓了一些赶集的老百姓。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成武、邓华将军率领八路军，经过蔚县开赴抗日前线，我县人民在蔚县党的领导下，立即掀起参军、收枪、做军衣军鞋的热潮，壮大了我军部队，充实了我军干部，建立了抗日政权，逐渐形成了抗日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

隆尧县的建党活动和党领导下的 人民革命斗争

(1924—1937)

张子政 郭慕文

隆尧县在“七·七”事变前是隆平、尧山两个县，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7年合并为隆尧县。隆尧县地处河北省南部，南临大陆泽，又名南泊，北濒宁晋泊，又叫北泊。纵贯南北的河流有漳河、滏阳河、滏河，横贯北部有沕河。过去十年九淹，人民生活困难。

隆平的党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仆后继，坚持到抗日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隆平的党，立即发动群众进行抗战，建立了冀南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冀南抗日模范游击支队。创建了冀南滏西抗日根据地。

一、建党活动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连年混战和残酷的封建剥削，严重地破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

1919年我国“五·四”运动的兴起，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同样日益深入普及到隆尧县的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推倒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在

滚滚的革命激流中，1924年朱林森同志在保定二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相继介绍了同学郭慕文、李培准、侯薪等同志入团。他们利用学校假期回县发展革命组织。1925年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县委，1926年建立了中共隆平县委。当时是经来县巡视工作的共青团北方区巡视员刘子奇同意的。于同年暑假期中，在陈村大庙（玄帝爷庙是个小学校，薛计田任教员）召开了共青团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决议：凡年满十八周岁的共青团员，工作积极，肯干，有成绩的，均转为共产党员，建立隆平县党的组织，并选出县党的第一届委员会。书记朱林森（卸去县团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兼组织部长高爽秋，统战兼农运委员张芥士，青年委员兼共青团支部书记薛计田，宣传委员阎登高。并报经党北方区批准。当时县委会代号“隆直”，共青团代号“龙芝”，国民党代号“龙鲜知”。党也称“大学”，英文代号“CP”，共青团称“中学”，英文代号“CY”，国民党称“民学”。

1926年到1927年前半年是隆平县党群革命组织发展的高潮。不仅建立了党团的县一级组织，而且在城乡学校也建立了党团组织。县立师范讲习所建立了团支部，由张振邦（即张子政）、曹印堂、谢桂田、曹增新等同志组成。完小学校团支部由朱春祥等同志组成。城关四铺、王尹、魏家庄、柏舍、苏家庄、马栏、十来口、刘通庄、枣林庄、韩庄、车往村等二三十个村庄，建立了党团组织，党团员约二三百人。党组织基本上布满了全县。凡有党团活动的村庄，也发展了农民协会，办了农民夜校，培训了基干和积极分子，全县有农民协会会员约四五百人。只是魏家庄就有会员一百多名。还成立了小学教员联合会，不少教职员工参加了组织。

为适应当时白色恐怖严重的环境，1928年旧历正月二十，朱林森同志到苏庄，住到孙春生（又名孙季冬）家，召集了全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出席会的有朱林森、侯薪、薛计田、杨振山、